



【社会观察】

在台湾感受垃圾分类

□房伟

作为一个邋遢的中年学术男，我讨厌倒垃圾。主要是怕麻烦，也没有耐心。我经常几天才倒一次垃圾，满满地弄上一大包，“咣”地丢进垃圾箱，算是万事大吉。但不可否认，从垃圾处理这样的小事，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文明程度与生活态度。

据说，台湾有个狂热喜欢张爱玲的“张迷”，为接近张爱玲，就在张爱玲住处隔壁租了房子，天天等着张倒垃圾后，去翻捡那些垃圾，窥视张爱玲的身体状况、饮食喜好与生活细节。这个“张迷”还在台湾报纸开了个专栏，津津有味地介绍张爱玲近况。当然，这件事的结果就是张爱玲知道后迅速搬家，将垃圾和“张迷”都留在原地——可见，“垃圾”不是小事。

言归正传，下面说说台湾的“垃圾故事”。到台湾访学第一天，就遇到了尴尬事。我和另一位访问学者去东吴大学的学生食堂吃饭。台湾的大学食堂，口味偏于台湾本地小吃，欧美快餐和日韩式菜肴，中式热炒并不很多。我们吃饭时，遇到东吴大学一位退休的刘教授。大家很开心地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吃完饭，我很自然地将餐盘带到集中投放地，轻轻地放在那里。谁料，刘教授很认真地对我说，房老师，这样不行呀。

我吓了一跳，担心自己做了什么丢人的事，忙询问刘教授。刘教授见我窘迫，善意地笑笑说，您的餐余没分类，值班学生看到不太好。

我有些迷惑。我并没有把餐盘放到大厅，而是带到集中地，难道这样还不够？刘教授很认真地帮我分类。我这才看清楚，餐余集中地，并不像内地的大学食堂这样，集中堆放后由保洁工清洗，或将餐盘和碗筷简单分类，而是分类特别细致，简直到了让人惊讶的地步：餐盘要自己清理好，有剩菜袋、剩饭袋、剩汤袋，筷子、勺子、小碗都有安放处。装零食的纸盒也有专门收集处。不用保洁工整理，学生们都自觉地清理餐盘，进行餐余分类，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刘教授还告诉我，这样分类，不仅尊重保洁工的劳动，且清理了环境，更重要的是，进行细致分类后，有利于垃圾回收。东吴大学几万名学生，食堂有好几个，一天下来，经过这样整洁的食堂餐余分类，多数都可以回收利用。比如说，剩饭和剩菜就可作为乡下农田积肥进行发酵，节省了能源。

此后，我注意观察，整个东吴大学的确非常整洁，没有痕迹、烟头、废弃物，路面连纸片也看不到。我们访问学者住的东荆学庐，更是整洁得吓人，到处光滑可鉴。每栋教学楼下，都有“惜字庐”，就是一个大铁箱，专门收集废纸，再打成纸浆，回收利用。

最让我们惊讶的，还是东吴大学的垃圾箱。一般垃

圾箱，都是简单分为“可回收”与“不可回收”两大类。东吴大学的垃圾投放处却非常细致：厨余（又分生厨余与熟厨余，工人给这两类垃圾都用上带盖的大塑料桶，防止异味）、废纸、瓶子（又分玻璃与其他材料）、塑料制品、金属物、木质品、大宗物件（主要是丢弃的废旧大物件）……最大的一个是标有“其他物品”的大箱。箱子上都有中、英、日、韩等几类语言，以便于外国学生辨识。每次倒垃圾，我都细细地思量半天。幸好刘教授专门向我传授了垃圾分类“窍门”，就是先找两个垃圾袋，进行大分类，然后再细分。我在这方面较笨拙，但俗话说“入乡随俗”，来到东吴大学，还是遵从人家的规矩吧。

不久，电视台报道了一个有关垃圾分类的事件，让我对环境保护意识有了更深的认识。小区居民投放垃圾比大学更严格，并不是随时随地，而是一天两次，有专业橙红色大型垃圾车开到指定地点，市民排队，有次序地投放。这还不算完，市民排好队后，会有检查员挨个打开居民垃圾袋检验。垃圾不分类的居民，最高可罚款5000台币！有位老先生因年龄太大，没有进行垃圾分类，和工作人员争执起来。一怒之下，他将垃圾倒在了工作人员头上。老先生没有被抓，却被教育了一番。这件事，在我看来，似乎有些小题大做，但也能看到，台湾人真的在乎保护环境，不只是嘴上说说。

在台湾生活了一段时间，慢慢我也习惯了垃圾分类。有一天，我住的东荆学庐101房间门突然被敲响。我打开门，是宿管科的吴小姐。她是一位开朗和气的姑娘，见人就笑。吴小姐对我说：房老师，这些垃圾是不是您放的？她说这话的时候却没笑，表情挺严肃。我出门看，门外窗台上放着两大包垃圾。我有些奇怪，随即明白了，前几天来了几个访问学者，他们肯定不了解垃圾分类，就把垃圾随意放在了楼下。我恰巧住在一楼的楼梯口，“躺着中枪”，被误认为是丢垃圾的人。我苦笑，解释了一通，心里七上八下。吴小姐没生气。她不能确认不是我，但很有耐心地再次为我讲解了垃圾投放分类。她又到楼上，去找那几位刚来的访问学者。我不禁为她的细致耐心而感动。

转眼半年过去了，我从东吴大学回到了我所在的学校。每每回想点点滴滴，最难忘的几件事，就有“垃圾的故事”。现在，我也养成了垃圾分类的习惯，每次倒垃圾，都要细致地分类。真希望我所在的大学和城市也尽快推行这些有益环保举措。保护环境，就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本文作者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台湾东吴大学访问学者）



【窥海斋】

历史认识问题很重要 第二次见到的村上春树：

□林少华

前不久，村上春树新作《刺杀骑士团长》因提及南京大屠杀而引人关注。其实，早在二十多年前的《奇鸟行状录》等作品中即已提及。2008年第二次见村上时，他曾当面对我说“历史认识问题很重要”。下面就请允许我简要介绍一下那次见面的情况。

2008年11月初，我去东京大学参加“东亚与村上春树”国际学术研讨会。借赴会之机，我于10月29日见了村上春树。2003年初我们见了一次，这次是第二次。但不是我一个人去的，是同台湾的村上作品主打译者赖明珠、马来西亚的村上作品译者叶惠以及翻译过村上部分文章的台湾辅仁大学张明敏三位女士一同去的——在不同地区以不同风格的汉语共同翻译村上这四个人同聚一堂并不容易，而一同去见村上本人就更非易事。加之村上本来就不轻易见人，所以这次会见在某种意义上不妨说是历史性的。

村上事务所年初搬家，但仍位于南青山这个东京黄金地段，在一座不很大的写字楼里面。周围比较幽静，不远就是村上作品中不时出现的神宫球场、青山大道和青山灵园。虽然时值晚秋，但并无肃杀之气。天空高远明净，阳光煦暖如春，银杏树郁郁葱葱，花草仍花花绿绿，同女性的裙装相映生辉。

按门铃上楼，一位举止得体的年轻女助手开门把我们迎入房间。房间不很宽敞，中间有一道类似屏风的半截浅灰色隔离板，前面放一张餐桌样的长方形桌子，两侧各有两把椅子，我等四人分别坐在两侧。很快，村上春树从“屏风”后面快步走了过来。一身休闲装：深蓝色对襟长袖衫，里面是蓝色T恤、蓝牛仔仔裤。他仍然没有像一般日本人那样和我们鞠躬握手，径直走到桌头椅子坐下，半斜着身子向大家点头致意。我看着他。距上次见面已经五年半多了，若说五六年时间没在他脸上留下任何痕迹，那并不准确——如村上本人在作品中所说，时间总要带走它应带走的東西——但总的说来，变化不大，全然看不出是年近六十的人（村上1949年出生）。依然“小男孩”发型，依然那副不无拘谨的沉思表情，说话时眼睛依然略往下看，嘴角时而带着浅浅的笑意，语声低沉而有速度感。整个人给人的印象随意而简

洁，没有多余的饰物，一如房间装修风格。

自1979年发表处女作《且听风吟》以来，村上已差不多勤奋写作了三十年。“三十年间我有了很大变化，明白自己想写的是什么了。以前有很多不能写的东西，有能力上所不能写的。但现在觉得什么都可以写了。写累了，就搞翻译。写作是工作，翻译是爱好。一般是上午写作，下午搞翻译。”他又一次强调了运动和写作的关系，说他天天运动，“今天就去健身房打壁球来着。但跑步跑得最多。因为不久要参加马拉松比赛，所以现在每天跑两个小时左右。写作是个体力活，没有体力是不行的，没有体力就无法保持精神集中。年轻时无所谓，而过了四十岁，如果什么运动也不做，体力就会逐步下降。过了六十岁就更需要做运动来保持体力。”

问及东西方读者对他作品的反应有何差异，他说差异很大，“欧美读者接触加西亚·马尔克斯等南美洲文学的时候，感觉自己读到的是和英语文学完全不同的东西，从而受到一种异文化冲击。读我的作品也有类似情况，觉得新鲜、有异质性。这点从读者提问也看得出来。欧美读者主要关注我的作品的写法本身和后现代元素，亚洲读者的提问则倾向于日常性，接受方式更为自然。”另一方面，他也承认自己的创作受到美国当代作家的影响，“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许多多，例如比喻手法就从钱德勒那里学到不少。”

话题转到《挪威的森林》拍电影的事。媒体前不久报道《挪》将由美籍越南导演陈英雄搬上银幕，村上说确有此事。“就短篇小说来说，若有人提出要拍电影，一般都会同对方协商，但长篇是第一次，因为这很难。不过《挪》还是相对容易的，毕竟《挪》是现实主义小说。”他说《挪》此前也有人提出拍电影，他都没同意。而这次他同陈英雄在美国见了一次，在东京见了两次，觉得由这位既非日本人又不是美国人的导演拍成电影也未尝不可。“将会拍成怎样的电影呢？对此有些兴趣。不过一旦拍完，也许就不会看了。以前的短片都没看，没有那个兴趣。”

说到“东亚与村上春树”这一议题时，我说我认为他对东亚近现代历史的热切关注和自省、对暴

力的追问乃是村上文学的灵魂，村上说有人并不这么认为。他说历史认识问题很重要，而日本的青年不学习历史，所以他要在小说中提及历史，以便使大家懂得历史，并且也只有这样，东亚文化圈才会有共同基础，东亚国家才能形成伙伴关系。

最后谈到对鲁迅的看法。

村上的短篇集《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中有一篇叫《完蛋了的王国》，其中的男主人公Q氏是一家电视台的导演，衣装整洁，形象潇洒，文质彬彬，无可挑剔，任何女性走过都不由得瞥他一眼，可以说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精英和成功人士。耐人寻味的是，藤井省三教授在这样的Q氏和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之间发现了“血缘”关系：其一，“两部作品同有超越幽默和凄婉的堪称畏惧的情念”；其二，两个Q同样处于精神麻痹状态。也就是说，作为鲁迅研究专家的藤井教授在村上身上发现了鲁迅文学基因。作为中国人，我当然对这一发现极有兴趣。这次有机会见村上本人，自然要当面确认他是否看过《阿Q正传》。村上明确说他看过。学生时代看过一次，十几年前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当驻校作家讲长谷川四郎的短篇《阿久正的故事》（日语中，阿久同阿Q的发音相同）时又看了一次，“很有意思”。问及他笔下的Q氏是否受到鲁迅的阿Q的影响，他说那是“偶然一致”。但他显然对鲁迅怀有敬意：“也许鲁迅是最容易理解的。因为鲁迅有许多层面，既有面向现代的，又有面向国内和国外的，和俄国文学相似。”

回国后赶紧翻阅他对《阿久正的故事》的品评，里面果然涉及对《阿Q正传》的评价：“在结构上，鲁迅的《阿Q正传》通过精确描写和作者本人截然不同的阿Q这一人物形象，使得鲁迅本身的痛苦和悲哀浮现出来。这种双重性赋予作品以深刻的底蕴。”并且认为鲁迅的阿Q具有“‘一刀见血’的活生生的现实性”。

不用说，一个人能够理解另一个人——何况认为“最容易理解”——无非是因为心情以至精神上有所相通之处。所以，村上上的Q氏同鲁迅的阿Q的“偶然一致”，未尝不是这一意义上的“偶然一致”。

（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

□□□本
出设美版
品计编编
：：：：
副壹马孔
刊纸晓晓
编纸迪迪
辑工室
中：心